

批判与重构:从“民族文化自治”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闫曦月

(青岛黄海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青岛 266000)

[摘要]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与列宁的批判性对话并不是简单的策略分歧,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两种认识论范式的根本性对立。新时代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以列宁的阶级分析为根基,又以“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创新弥合了鲍威尔“文化自治”与列宁“民族自决”的二元对立,实现了“政治符号整合”与“文化特性保存”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了对鲍威尔与列宁理论范式的历史性超越。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建立“制度—经济—文化”的三维协同机制,还需要通过量化指标体系和数字技术应用将铸牢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挑战,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民族文化自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宁;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闫曦月(1996—),女,山东潍坊人,青岛黄海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lzujbkys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4001>

[中图分类号] D63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引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1905年,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中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提出将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并按照自治原则管理少数民族事务。随后,斯大林(1912)年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实质上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其不过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列宁(1913)在《民族问题纲领》中对其进行批判,列宁认为“民族文化自治”违背资本主义经济条件,是机会主义幻想,缺乏实证依据,并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进行了批判。1991年,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普遍开始探索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如拉脱维亚1991年通过的《自由发展和民族及族群文化自治权法》赋予少数民族广泛的自治权,包括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和 cultural 组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1996)强调国家认同与文化包容,通过法律保障各民族语言地位、支持双语教育体系,试图在多元文化中构建统

一国家认同。

这种将民族文化自治与民族自决权相剥离的阐释尝试经译介传入国内,引发部分研究者对传统理论范式的再审视。关于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定性问题,王幸平(2015, 2016)通过系列研究指出,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并非简单的“去政治化”,而是通过“民族登记制度”与“非地域性自治”对多民族国家中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有机调整”,其核心在于调和民族认同与国家统一性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造性推进”;黄漫、刘同舫(2016)从哲学角度否定鲍威尔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批判其理论隐含的“自由主义底色”,认为其混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未能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关于列宁阶级分析的适用性问题,王幸平(2017)、王家忠(2022)、张祥云(2000)强调列宁批判的核心在于反对以文化自治替代政治革命,其阶级分析路径仍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孟飞、姚顺良(2017)认为列宁批判服务于俄国革命需要,需结合全球化背景辩证吸收鲍威尔的文化治理智慧。关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陈云生

(2007)主张通过法律明确民族文化自治权,认为制度保障是化解矛盾的基础;王幸平(2023)提出“交往交流交融”理论,主张通过文化互动构建超越民族差异的共同体认同;孟飞(2019)结合全球化背景重新定位鲍威尔理论的批判性,强调经济整合优先性。

总的来说,国内研究呈现三大趋势:其一,突破“修正主义”标签,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角度重新定位鲍威尔理论;其二,深化列宁批判的语境化解读,平衡阶级原则与时代适应性;其三,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创造性结合。虽然国内学者围绕“民族文化自治”与列宁的批判已取得显著成果,但仍存在若干理论盲点与实践困境。第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批判性对话缺失。现有研究对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的借鉴多集中于“文化多样性尊重”层面,但忽视了其理论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批判内核。第二,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的割裂。孟飞等学者强调通过区域协调发展解决民族矛盾,但未能揭示经济发展背后的权力关系重构。当前研究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为文化工程,但较少探讨文化认同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三,民族问题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衔接不足。现有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缺乏深度剖析。

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面临历史性转折:既需直面全球化与数字技术对民族认同的解构与重塑,又需回应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围剿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霸权的现实挑战。本文试图以“阶级—文化—制度”三维整合替代单一维度分析,构建“经济基础重塑—文化符号创新—制度保障完善”协同机制,实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为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引领人类解放的意识形态范式。唯有实现从“民族文化自治”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范式转换,才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根基,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开辟新境界。

一、理论溯源: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的实质与列宁批判的逻辑

(一)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内核

1905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凝聚党内关于民族问题的共识,委托鲍威尔撰写理论著作《民族问题与社民党》。该专著于1907年问世后,“民族文化自治”这一创新理论构想首次得到系统性阐述。鲍威尔将民族定义为“具有共同性格的自治个人联

盟”,强调民族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而非地域共同体。民族的本质是“由共同历史命运塑造的文化共同体”,其核心是共享的语言、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民族并非天然形成的实体,而是通过成员自愿选择(基于文化认同)形成的“自治联盟”。不难看出,鲍威尔对民族的理解突破了传统地域性民族观的限制,更强调民族的文化属性。传统民族观将民族与领土绑定,这极易导致民族间的领土冲突。由于民族是一种文化共同体,那么就必然要允许同一民族成员在不同地域能够建立统一机构来管理教育、语言等事务。其必然也会导致文化事务与政治权力分离,形成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鲍威尔提出建立“民族文化委员会”等超地域机构,由各民族成员自主管理教育、艺术、宗教等文化事务。这些机构不依赖领土划分,而是通过“民族登记制度”确定成员身份,国家通过法律保障其权利并分配资源。鲍威尔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虽存在经济对立,但共享同一民族文化(如德意志资本家与工人共同维护德语文学传统)。通过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可暂时搁置阶级矛盾,形成跨阶级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社会基础。当然。这一点也是列宁着力批判的一个观点,被列宁认为是“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妥协”,掩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敏锐地指出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论证了其在民族建构中的作用,然而它低估了民族主义与阶级矛盾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导致其最终沦为一种维系多民族共同体的折衷方案。脱离经济基础与政治结构,任何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都将流于空想。

(二)列宁批判的三大维度

1912年前后,俄国的崩得分子、“取消派”等机会主义势力开始鼓吹并引入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严重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党构建跨民族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列宁意识到这种理论移植不仅忽视了俄国民族分布的复杂性格局,更潜藏着消解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强化资产阶级民族认同的政治风险,因此,列宁撰写了大量论著,对“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做了深刻的批判。列宁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忽视了阶级矛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鲍威尔将民族定义为“命运共同体”,强调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主张通过民族文化自治实现民族平等。

在列宁看来,这种定义抽离了民族问题的阶级性。列宁指出,任何民族文化中都包含统治阶级的压迫性文化和被压迫阶级的进步性文化。鲍威尔的理论将“民族文化”视为统一整体,掩盖了阶级分化的现实。其未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帝国主义剥削结构,也未能揭露资产阶级利用“民族文化”口号分裂无产阶级的实质。鲍威尔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验社会学工具,试图调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本质上是一种折中主义,既承认资本主义的民族压迫,又幻想通过改良主义路径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这种“局部修正”正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背离。

第二,“民族文化自治”阻碍了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变种。列宁指出,通过文化自治实现民族平等的方案回避了政治权力的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所进行的经济剥削,文化自治是无法消除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的。鲍威尔的理论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却忽视了工人阶级超越民族界限的共同利益。其将工人运动局限于民族文化界限内,导致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割裂。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破民族压迫,而非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局部改良。鲍威尔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假设上,但列宁认为,20世纪初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

第三,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揭示了鲍威尔理论在现实中的不可行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潜在危害。文化自治要求按民族划分个人身份,这在多民族混居地区极易激化矛盾。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交错居住格局使得按文化划分行政单位既不现实,也可能引发领土争端。列宁主张以地域自治替代文化自治,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权利(如语言平等)实现国家统一。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资源再分配、工业化援助等措施消除被压迫民族的落后状态。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列宁坚持“民族自决权”与“社会主义集中制”的统一,允许各民族自愿加入联盟,同时又通过计划经济和文化革命推动阶级融合。在列宁看来,文化自治会助长地方民族主义,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凝聚力。

(三)鲍威尔与列宁理论交锋的本质

鲍威尔与列宁的理论交锋,绝非简单的策略分

歧,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两种认识论范式的根本性对立。这场论战既折射出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应对民族问题的路径分化,更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民族”关系命题的复杂张力。

其一,哲学基础的对立。鲍威尔的“文化决定论”根植于新康德主义认识论,将民族视为由“共同命运体验”建构的文化共同体。这种理论预设了民族文化的先验性,认为文化性格(Nationalcharakter)作为“历史积淀的客观精神”,具有超越阶级分野的稳定性。与之相对,列宁的“阶级革命论”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将民族问题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物质生产关系中考察。列宁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将民族压迫归结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产物,指出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无法改变帝国主义剥削结构。其二,政治实践的分野。两种理论范式的对立,在政治实践层面具体化为“文化自治改良”与“阶级革命解放”的路线之争。鲍威尔主张通过“渐进式文化赋权”实现民族平等,列宁则从革命辩证法出发,提出“民族自决权”的政治纲领。其三,历史哲学的对峙。鲍威尔的文化决定论暗含黑格尔主义目的论色彩,将民族发展视为文化精神自我实现的线性过程。列宁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出发,建构了民族问题历史阶段性理论。

二、现代性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范式突破

鲍威尔与列宁的理论交锋的历史启示在于:任何民族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承认文化认同的建构性力量,更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之中。中国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创造性发展出“多元一体”治理模式:既以列宁的阶级分析为根基——通过制度设计消除民族间事实不平等,又以“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创新弥合了鲍威尔“文化自治”与列宁“政治自决”的二元对立,实现了“政治符号整合”与“文化特性保存”的有机统一。

(一)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明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就是民族融合,其不仅是民族生命力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呈现,更是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价值追求。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

不只是一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一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而要想实现民族融合,其一要政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调和民族矛盾、促进融合的前提,恩格斯以欧洲多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佐证了这一逻辑;其二要文化交融,文化交融通过消除民族隔阂与培育共同体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融合的必由之路;其三要进行共同体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真正的共同体的建设却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对文化自治与阶级联合二元对立的框架的超越。中华民族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由多元群体经过长期互动融合,通过共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而形成的社会实体,其本质在于各民族对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凝聚与认同升华。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各民族通过共同塑造国家疆域、历史、文化与精神而形成的整体性民族实体,其形成兼具自然聚合与政治建构的双重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几千年的碰撞、折冲、融合中形成的。也是在这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本质是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

(二)制度设计:从政治整合到文化交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时代,通过将“五个认同”嵌入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目标,更好地引导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五个认同”是指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其蕴含政治整合机制,是现代国家通过领土整合、国民整合、文化整合、政党整合和制度整合,实现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过程。“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内容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五个认同”的目标导向。这五个认同相互关联、递进循环,形成“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各民族对共有身份、共同命运和共享价值的认同,而文化融合通过消除文化隔阂、强化共同价值,成为这一意识的“黏合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通过“历史—语言—教育”三位一体的文化整合路径,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首先,在共享文化遗产领域,国家构建中华文化标识体系,将各民族文化遗产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框架。通过文旅融合重构“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其次,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作为沟通纽带,我国依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在民族地区广泛建立普通话培训基地,实施“语言扶贫”与职业技能协同推进的培训模式。语言互通推动了民族间社会交往深化,推动了情感共同体构建。最后,在统一教育体系层面,新版教材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以“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历史记忆重塑文化根脉、语言互通激活社会网络、教育融合培育价值共识,三者协同发力,形成“文化整合—情感联结—国家认同”的递进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既是“五个认同”的具象化表达,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同体意识的战略基石,为民族复兴提供深层精神凝聚力。

(三)实践突破:意识形态安全的系统防御机制

基层党建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维护民族团结和意识形态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基层党组织通过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组织体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三会一课”必修内容,确保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直达基层神经末梢。如在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承担着“风险雷达”职责。基层党建在维护民族团结与意识形态安全中构建起多维理论防御体系。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的层级渗透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指令的垂直传导,依托系统性整合机制将党的民族理论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形成政治整合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强化;另一方面,运用符号化传播策略

将抽象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实践,通过代际传递机制实现价值认同的深层沉淀,构建起抵御意识形态侵蚀的心理防御屏障。

经济发展作为族际关系的物质基础,在构建民族团结意识形态安全防御机制中承担着结构性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这指明了经济互动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价值。通过构建区域经济共生机制,将市场要素的跨民族流动转化为文化认同的催化剂。该防御体系遵循“政治认同—经济赋能—文化再生”的闭环作用机理,使族际互动从经济领域的物质交换升华为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共识。正如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指出的,“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这种以经济互动促价值整合的路径,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兼具物质基础与理论深度的防御范式。

三、当代启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向度与全球视野

鲍威尔与列宁的论争揭示了“文化自治”与“阶级革命”的张力。新时代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范式突破。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主义”与“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以及一些境外势力对民族问题的干涉都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潜在风险。因此,必须基于“制度保障完善—经济基础赋能—文化符号创新”的协同机制,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体化实践路径。

(一)制度体系建设:“五个认同”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体系完成意识形态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转换,即实现“抽象精神认同到具体社会关系再生产”。意识形态的物象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实践论意义。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形态时指出,“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制度体系同样通过指标化运作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对象。这种转换并非简单的形式移植,而是蕴含着生产关系再创造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只有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共同体

意识形态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固定下来,才能真正实现其自生产。通过“五个认同”指标体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地方政府KPI体系,建立“经济互嵌度”“族际通婚率”“双语教育覆盖率”等量化指标,实现柔性认同的刚性转化。这些指标体系的构建,实质上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观念上层建筑领域,下沉为可测量、可调控的社会存在形式。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将抽象的认同具象化,形成可操作的规范,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都能精准对接各族群众的需求,从而在微观层面夯实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当然,在制定量化指标的进程中,也需警惕陷入“物化意识”的风险。当共同体意识被简化为KPI数字时,可能重蹈商品拜物教的覆辙,将动态的社会关系异化为静态的治理指标。因此,还需要建立动态反馈机制,使制度体系既保持结构稳定性又具备历史开放性,实现动态调整与持续优化,确保政策适应性与实效性,最终形成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当制度体系成功将精神认同转化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机制,便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实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经济基础重塑:制度创新与数字赋能的共同体建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矛盾在于破解资本逻辑对民族关系的异化。当前民族地区发展中,资本通过文化符号化切割与经济成果差异化分配,导致民族文化沦为消费符号、发展红利分配失衡,这构成了共同体意识解构的物质根源。唯有革新生产关系,才能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共同体认同的物质载体。其一,在民族地区文旅开发中,防止民族文化被资本切割为消费符号。其二,可以通过集体经济合作社重构资源分配机制,使发展红利转化为共同体认同的物质基础。在公有制框架下使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具象化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实体感知,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建设的有机衔接。其三,在数字经济中嵌入“共享共治”规则,打破“流量逻辑”对民族文化认同的解构。数字共同体模式能够突破传统“资源诅咒”困境,破解发展悖论并促进成果共享。以数字技术为纽带、以共享共治为特征的共同体模式,不仅重塑了民族地区发展范式,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重构了“多元一体”的实现形式——通过数字空间的符号互嵌、记忆共享和规则共建,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技术赋能的现代性表达。当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成功将资本逻辑转

化为共同体建设动能,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实现了“物的流通”向“认同的流动”的质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

(三)文化符号创新: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现代转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机制在于实现文化符号的阶级性重构,即通过符号体系意识形态再生产完成“民族文化表象”向“社会主义共同体意识”的辩证转换。第一,通过红色记忆的符号再生产,实现民族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创造性转化。如凉山彝族自治州“悬崖村变迁展陈馆”的实践,既保留彝族传统民居符号,又通过现代技术再现党领导下的脱贫攻坚历程,使“火塘文化”与“红色基因”在时空叠合,实现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政治话语的有机融合。这种实践不仅为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提供了范式,更在学理层面回应了“如何通过文化再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第二,通过“阶级—文化”的辩证互构,实现民族符号向共同体符号的系统转化。阶级关系的重构必然伴随符号体系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当物质生产中的依附性关系被打破时,原本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文化符号便脱离其原生语境,成为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工具。民族符号便不再是族群区隔的标记,最终完成从“族群文化载体”向“中华文化基因”的质变。第三,通过技术革新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从历史结论转化为可体验的认知。如河南博物院“元宇宙黄河文化展”突破物理空间限制,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将二里头夏都遗址、龙门石窟等文化符号进行时空重组。参观者在虚拟空间中既可扮演唐代粟特商人参与丝绸之路贸易,又能以当代建设者身份体验红旗渠开凿。这种方式为全球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样本。当文化符号体系成功实现从“民族表象”到“共同体意识载体”的质变,便使抽象的文化认同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现代性体验,最终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长城。

结语

从“民族文化自治”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范式跃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21世纪中国实践中的创造性突破。这一转变不仅实现了阶级分析与文化建构的辩证统一——通过经济基础重塑消解民族文化的阶级依附性,以制度创新完成符号体系的共同体转化,更构建起超大规模

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新范式,为数字文明时代的意识形态整合提供了系统性方案。历史地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战略选择,更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之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不仅为人类破解民族问题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智慧,更在文明形态意义上昭示:当民族差异的扬弃与人类解放的进程同频共振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便成为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的最强回响。

参考文献:

- [1] 奥托·鲍威尔.鲍威尔文选[M].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13,62-63.
- [2] 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诸夏怀斯社,2016:249-250.
- [3] 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3.
- [4] 王幸平.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的历史命运及现实意义[J].人民论坛,2015(35):245-247.
- [5] 王幸平.一个被批判的批判者: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及其审视[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6(2):198-205.
- [6] 王幸平,姚顺良.“去政治化”还是“有机调整”:民族文化自治再审视[J].兰州学刊,2015(4):30-34.
- [7] 黄漫,刘同舫.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角度及其哲学定位[J].学术研究,2016(6):17-23,177.
- [8] 王幸平.论列宁对于“民族文化自治”的三重批判[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2):104-110.
- [9] 张祥云.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规模建制理论[J].世界民族,2000(3):1-8.
- [10] 孟飞,姚顺良.奥地利民族问题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方式[J].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7(3):84-92.
- [11] 王幸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及其局限[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1):60-66.
- [12] 孟飞.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奥托·鲍威尔论社会主义的民族策略[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2):157-164.
- [1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44-345.
- [14]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 [15]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9-140.
- [1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4,10.
- [17]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8.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1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0,157.

[20] 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6-7.

[21]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N].人民日报,

2023-12-16(1).

[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4,247.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3.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Ethnic Cultural Autonomy” to “Building a Stronger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YAN Xi-yu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Qingdao Huanghai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China)

Abstract: Powell's theory of ethnic cultural autonomy and Lenin's critical dialogue are not simply tactical differences, but a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etween two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national theory. The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proposed in the new era is based on Lenin's class analysis, but also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Powell's “cultural autonomy” and Lenin's “cultural autonomy” with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mingling”.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ridges the dichotomy between Powell's “cultural autonomy” and Lenin's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nation”, realizes the organic unity of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symbols”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uly realizes the dualism between Powell's and Lenin's theories. It has realized the organic unity of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symbols”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uly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 of Powell's and Lenin's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 today's globalized context,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requires not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y mechanism of “system-economy-culture”, 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into an operational governance practic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a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and digital technolog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Western multiculturalism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Key words: ethnic cultural autonomy; build a stronger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Lenin; ideology